

陈平原 主编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导言集

蔡元培等著 陈平原 导读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教育出版社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导言集

蔡元培 等著
陈平原 选编 导读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导言集 / 蔡元培等著 ; 陈平原
导读. — 贵阳 : 贵州教育出版社, 2014. 7

(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/陈平原主编)

ISBN 978-7-5456-0608-9

I. ①中… II. ①蔡… ②陈… III. ①序言—作品集
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25349 号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导言集

蔡元培 等著 陈平原 导读

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

(电话 0851-8654672 邮编 550004)

印 刷 贵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24.25 印张

字 数 350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6-0608-9

定 价 45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:贵阳市友谊路 186 号 电话:0851-6784181-2127 邮编:550001

总序

□ 陈平原

为刚刚逝去的“20世纪”作总结，似乎是今日中国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对于崛起于艰难之际、致力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人来说，20世纪既灾难深重，又生机勃勃。时过境迁，不管是“灾难”还是“生机”，其蕴涵的酸甜苦辣，都将成为后人咀嚼回味的不可或缺的“历史文化遗产”。

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“大时代”，阅读者最好心存敬畏。不要说风和日丽，即使是斜阳余晖，也都值得论者认真鉴赏与品味。有感于此，本丛书不取大刀阔斧放言高论的姿态，而宁愿“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”。似乎有必要提醒笃信“进化”的国人，略为调整视线，俯下身来，流连身边的风景。对于有心人来说，一枝一叶总关情，细微处，同样可以见精神。不妨借助一本本曾经激动过一个时代的书籍的重新阅读，触摸那很可能早就被历史的风沙抹平的精神印记，体会先辈们蹒跚的足迹。

相对于有形的政治、经济乃至学术、文化的成果，一代人的“精神遗传”显得不太张扬，故很难被心境浮躁的后来者所感知。重读“旧书”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曾经有过的知识、信仰、理想，乃至具体而微的心境；更可以通过其在历史上的“存在与遗失”，理解风光无限且变动不居的世界。

与一般意义上的遴选“经典”不同，本丛书关注的是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，故必然跨越具体的学科限制，且兼及著译与雅俗。选书的标准，在于

当时以及后世的“影响力”，而不问是否“藏诸名山，传之后世”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这种影响力可能迅速消失，也可能与日俱增，更可能时起时伏。描述如此奇妙的“书的命运”，并给予恰当而深入的解读，对于测量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与文化走向来说，也许是很好的入口处。

这里有政治家的宏愿、思想家的深思、学问家的博识、文学家的激情，以及普通人的常识与悲哀。不管是哪一类，希望均有值得述说的“接受的故事”。也就是说，书本身的魅力固然重要，可那留在历史上的“长长的影子”，同样令人怦然心动。

与书斋里的宏论不同，本丛书希望沟通专家常识与大众趣味，借“读书”回顾先辈的足迹，丰富当代人的精神感受与历史意识，故关键在于“同情之理解”，而不是判断与裁定。具体的工作策略是：将书籍本身的评介与“接受史”的叙述融为一体，并掺入个人的阅读体验。假如撰写导读的专家们之“生花妙笔”能勾起大众的阅读兴趣，使“旧书”介入“新世纪”中国人的精神生活，则功莫大焉。说到底，书，并非越新越好；人，也不一定越活越精神。这才有必要不时地回顾历史——包括阅读并未完全过时的好书。

理论上，只要是真正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著作，都有可能进入我们“重新阅读”的视野。可在具体操作中，却因某种难以逾越的障碍，不能不略有回避。另外，虽然丛书的选目已经大致确定，但考虑到各位专家的写作进度，出版时无法完全依照原作的年代排列。这两点，敬请读者原谅。

本丛书作为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项目，并不划地自牢，而是期待更多学界朋友与我们携手，借助“读书”，重新理解并阐释20世纪中国人并非贫瘠的精神生活。

丛书主编 陈平原

目 录

在“文学史著”与“出版工程”之间

——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》导读 陈平原(1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总序 | 蔡元培(36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建设理论集》导言 | 胡 适(43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建设理论集》目次 | 胡 适 编选(69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文学论争集》导言 | 郑振铎(72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文学论争集》目次 | 郑振铎编选(91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一集》导言 | 茅 盾(96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一集》目次 | 茅 盾 编选(123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》导言 | 鲁 迅(126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》目次 | 鲁 迅 编选(138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三集》导言 | 郑伯奇(141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三集》目次 | 郑伯奇编选(164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一集》导言 | 周作人(166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一集》目次 | 周作人编选(178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》导言 | 郁达夫(181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》目次 | 郁达夫编选(197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》导言 | 朱自清(202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》目次 | 朱自清编选(230) |

◇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导言集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戏剧集》导言 | 洪 深(245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戏剧集》目次 | 洪 深 编选(331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史料·索引》序例 | 阿 英(332)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史料·索引》目次 | 阿 英 编选(338) |

附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前言 | 赵家璧(344) |
| 话说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 | 赵家璧(346) |

在“文学史著”与“出版工程”之间

——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》导读

陈平原

1970年5月,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王云五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称:“我认为一个出版家能够推进与否,视其有无创造性的出版物。”在他看来,商务70年间,只有30种出版物可归入其中。这30种出版物,包括中小学教科书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辞源》、各科词典、四部丛刊、百科小丛书、各种索引、万有文库、中国文化史丛书、丛书集成等^①。如此自我期许,很是令人钦佩。不过,王先生所标举的好书,主要功在出版,多半做的是学术积累或文化普及工作,仍然算不上是开创时代风气、引领思想潮流的“大书”。

还有另外一种关于报刊出版“创造性”的解读,那是五四新文化主将胡适提出来的。1923年10月,胡适给高一涵等写信,其中有:“二十五年来,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,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:一是《时务报》,一是《新民丛报》,一是《新青年》。而《民报》与《甲寅》还算不上。”胡适说这话,主要是给《努力周报》诸君打气,希望能承继《新青年》未竟的事业,“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,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”^②。因此,胡适并没解释为何谈论足以代表“一个时代”的杂志时,不提读者面很广的《东方杂志》。我的推测是:可以称得上“创造了”一个时代的杂志,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立场,这样才可能直接介入并影响时代思潮之形成与走向。强调照顾读者趣味(往往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),其结果必然是磨平棱角,记录而不是引导社会,因而也就不可能义无反顾地承担这一选择所与生俱来的风险。这一点,对比《新青年》与《东方

^① 参见王云五:《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》1189页,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。

^② 胡适:《与一涵等四位的信》,《努力周报》75期,1923年10月21日;见《胡适全集》第二卷513页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3年。

杂志》，很容易明白^①。

既是成功的“出版事业”，又在“思想革新”或“文化创造”方面有所建树，这样的成功先例不能说绝无仅有，但也并非俯拾皆是。放开视野，不局限于商务一家，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出版事业中，像王云五那样选取三五十种“有创造性”的出版物，我认为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—1936年出版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可以入围。

相对于皇皇巨著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，1940年10月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印行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》，只能说是一册“小书”。可这册363页的小书，1982年由上海书店影印重刊，在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，发挥了巨大作用。不说人手一册，起码也是广为传播、阅读与引用。十篇导论，或已成为“运动小史”，或被认作“研究范例”，对于关注1917—1927年的文学运动及创作的研究者来说，这不仅是“必读书目”，且规范着“眼界与趣味”^②。也正因此，《导论集》某种程度上可以“特立独行”，不一定非依傍那十卷大书不可。就像今人阅读《文章辨体序说·文体明辨序说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62）时，可以暂时搁置吴讷、徐师曾所选历代诗文一样。这种阅读趣味，自《导论集》成书之日起，就已经不可逆转——你既可以将其与《大系》对照阅读，也可以单独欣赏。

问题在于，流传甚广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》，并不仅仅是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诸多导言的“集锦”，其中的修订与删节，隐含着不同的编辑策略与文学眼光，值得仔细推敲。

① 参见陈平原《杂志与时代——为〈读书〉20周年而作》，《文汇报读书周报》1999年2月20日。

② 为总结“第一个十年”而编辑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，不只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，更提供了一幅相当完整的“文学史”图景。除了蔡元培高度概括的总序，胡适、郑振铎、茅盾、鲁迅、郑伯奇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洪深、朱自清、阿英等为各卷所撰导言，都是相当精彩的文学史论。这就难怪后世的研究者，常将其作为立论的根基。鲁迅的总结，历来被史家奉为圭臬；至于五十年代的突出茅盾、郑振铎，八十年代的注重胡适、周作人，主要源于政治环境的变化。倘若不考虑各家命运的荣衰与升降，单就学术思路而言，新文学创立者的自我总结，始终规范着研究者的眼界与趣味。参见陈平原《学术史上的“现代文学”》，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1997年1期。

一 从“大系”到“导论集”

不管是当初的出版说明,还是日后的阅读印象,一般都将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》视为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各卷“导言”的汇编^①。其实,情况远比预想复杂得多——不能说不是“导言”的结集,也不能说就是“导言”的结集。因为,《导论集》出版时,编者做了很多“技术处理”,目的是使其显得更像是一部独立刊行的文学史著作。这一点,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》书前的“出版说明”有明确的表述:“本书乃集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十册中所载各篇导言而成,故名《新文学大系导论集》,内计总序一篇,导言九篇,是第一个十年间中国新文学各部门综合的研究。”

将《大系》的“导言”结集成书,这一绝佳创意,早就潜伏在这套大书的编选过程中,也符合主编的设想及出版社的利益。“文选”的主要功能,不外存文献、见眼光、定经典、传久远,可规定每集冠以两万字的“导言”,明显是“别有幽怀”。《大系》尚未面世,出版商已在《良友画报》第103期上大做广告,主打词为“五百万字选材,二十万字导言”;《大系》即将出齐,《文学》5卷4号又刊登“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十大部之内容说明”,着重介绍的依旧是各家的“导言”或“序文”^②。“导言”成了《大系》的重要卖点,这正是日后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》得以单独成书的预兆。

赵家璧最初的设想是精选“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”,然后“统一规格,印成一套装帧美观、设计新颖的精装本”,只是因碍于版权,方才改为编选集。可由于郑伯奇、阿英、郑振铎、茅盾等人的积极介入,越做越认真,越想越宏伟,最终做成了“兼有文学史的性质”的一套大书^③。

所谓“文献”之外,“兼有文学史的性质”,主要指向各卷的“导言”。至于阿

^① 1982年上海书店以“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”的名义出版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》,其影印说明称:“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》,是三十年代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十卷本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各卷导论的汇编。全书对我国‘五四’以后第一个十年间的新文学运动作了全面的总结。据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10月初版本影印。”

^② 参见《良友画报》第103期,1935年3月;《文学》5卷4号,1935年10月。

^③ 参见赵家璧《话说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》,《编辑忆旧》161—183页,北京:三联书店,1984年;姚琪:《最近的两大工程》,《文学》5卷1号,1935年7月1日。

◇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导言集

英所编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史料·索引》的意义,必须是专家才能意识到。如果说《大系》的成功,很大程度取决于在“文学史著”与“出版工程”二者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,那么,《导论集》属于“二次开发”,目标很明确,只讲“史著”而不问“工程”。

为了使《导论集》看起来更完整也更完美,编者可谓煞费苦心。

首先,为入集的十文另拟标题。详细情况见下表:
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 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》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蔡元培: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总序》 | 蔡元培:《中国的新文学运动》 |
| 胡适: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建设理论集〉导言》 | 胡适:《新文学的建设理论》 |
| 郑振铎: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文学论争集〉导言》 | 郑振铎:《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》 |
| 茅盾: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一集〉导言》 | 茅盾:《现代小说导论》(一) |
| 鲁迅: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〉导言》 | 鲁迅:《现代小说导论》(二) |
| 郑伯奇: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三集〉导言》 | 郑伯奇:《现代小说导论》(三)【误植为《现代导论小说》】 |
| 周作人: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一集〉导言》 | 周作人:《现代散文导论》(上) |
| 郁达夫: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〉导言》 | 郁达夫:《现代散文导论》(下) |
| 洪深: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戏剧集〉导言》 | 洪深:《现代戏剧导论》 |
| 朱自清: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〉导言》 | 朱自清:《现代诗歌导论》 |

其次,《导论集》调整了《大系》的结构,改《诗集》在前为《戏剧集》优先。如此调整,可能存在文类的偏见,但更大的可能是对朱自清所撰“导言”不太以为然。入选各文中,被删节最多的便是朱文。

第三,《导论集》仅收九卷的“导言”,删去了本该入选的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史料·索引〉序例》。阿英所编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史料·索引》,对于整套《大系》来说至关重要。而且,以工作量计,十卷中此卷最吃紧。阿英所撰《序例》开篇即称:“依照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的整个编辑计划,和《史料·索引》册所能容纳的字数关系,在这里,我只能很简略地说一点关于本册编制经过的话。”虽然篇幅不长(六页纸),且侧重工作思路的介绍,但“序例”中牵涉不少文学社团及杂志创办等史实,并非可有可无。

第四,《导论集》删去了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一卷(即《建设理论集》)书前所刊的《前言》(赵家璧撰)。赵家璧在《大系》中的位置,到底是“主编”还是“责

编”，这一点下节辨析，此处不赘。单就文章而论，此《前言》确实与“第一个十年间中国新文学各部门综合的研究”无关，故被“导论集”的编者果断地割舍了。

第五，《导论集》对鲁迅、郑伯奇、朱自清三篇“导言”进行了删节。具体情况如下：删去鲁迅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〉导言》的第五节，也就是“临末是，关于选辑的几句话——”以下大约五百字；删去郑伯奇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三集〉导言》第八节的最后两句——“本书所选的范围以《洪水》第一周年为止。《月刊》以后的作品便没有选入”，而保留了涉及创造社各种刊物之间的联系那些文字；朱自清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〉导言》因体例特殊，被删节最多。前面的论述文字未动，接下来的“编选凡例”（八则）以及“编选用诗集及期刊目录”全被删去；保留“选诗杂记”，而删去了随后六七千字的“诗话”。

面对鲁迅等诸多大家专门为《大系》撰写的宏文，《导论集》编者竟如此“大动干戈”，实在不应该。可仔细辨析，你会发现，编者还是相当用心^①，所删均为编辑凡例之类，无关文学史论述的大局。如果说《大系》本就包含“选本”与“文学史”两个面向，那么，《导论集》舍弃前者，凸显后者，目的是将其改造成为一部多人合撰的“文学史”。

如果不是仔细校勘，发现诸多剪裁与调整的痕迹，单从这册独立发行的书籍看，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》还是可读性很高。这就牵涉到，到底是谁动的剪刀？《大系》乃良友图书公司所刊，《导论集》则属于良友复兴图书公司，二者关系如何？赵家璧《话说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》称：

一九三七年八·一三抗战爆发，良友图书公司因地处战区，损失惨重，随即宣告破产。一九三九年一月，改组为良友复兴图书公司，编辑部由我负责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偷袭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发生，随后，日寇入侵英法租界，“孤岛”时代的上海，从此结束。十八天后，良友与商务、中华、世界、大东、开明、生活、光明八家，同遭日寇查封。^②

此后，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先迁桂林，后搬重庆，有过若干宏伟规划，包括编辑《大系》第二辑、第三辑等。可惜的是，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，“1946年，良友复兴

① 如郑伯奇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三集〉导言》第八节“最后，关于编选的体例和范围，讲几句话”，这很像鲁迅被删去的第五节，可编者没有全删，而是区别对待。

② 赵家璧：《编辑忆旧》216页。

图书公司因股东内部纠纷,无形停业”,此事也就不了了之^①。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》初刊于1940年10月,按赵家璧上述的说法,此时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的编辑部乃由他负责。至于将十卷本的《大系》改造成精粹简便的《导论集》,是不是他本人操刀,不得而知。不过,赵先生对这册《导论集》起码并不反感,在《话说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》中四次引述^②。

从《导论集》的角度,反观《大系》的制作与传播,未始不是一个有趣的角度。更何况,本文的撰写,主要针对新编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导言集》的读者。

二 是“主编”还是“责编”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的扉页,明明写着“赵家璧主编”五个大字,难怪后世专门研究“编辑出版”的学者,要据此大做文章。除了讨论其出色的营销策略,更有表彰其如何“主帅点将”,“指挥着11员新文学名声赫赫的宿将,共同成就了这样的创举和奇迹”的^③。一个“名不见经传”的年轻编辑,促成了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的诞生,确实难能可贵。对于现代编辑出版史上这么一项“历史性的的大工程”,赵家璧功不可没;可要说他“亲手绘制了《大系》全新的设计蓝图,在成为总设计师的同时又担当了举帅旗的总工程师”、“犹如交响乐的指挥,不但举帅旗,而且纳众议,奏响了雄浑壮丽的乐曲,成就了《大系》多元复调的学术特色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”^④,则实在言过其实了。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之所以具有“多元复调的学术特色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”,恰恰在于赵家璧这个“主编”不像今人想象得那么权威、那么神奇。

这里的关键在于,今人理解的“主编”,乃运筹帷幄、指挥若定、一言九鼎,而民国年间活跃在出版界的“主编”,不一定是学界权威或文坛领袖,也可以是代表出版社利益、起协调作用的“责任编辑”。

① 参见赵家璧《编辑忆旧》217—221页。良友图书公司资深编辑马国亮撰文,谈及公司内部伍联德、余汉生、陈炳洪三驾马车的分崩离析,导致1938年的破产重组,以及1946年“股东意见分歧,同床异梦,彼此难以合作”,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,再度宣告停业。参见马著《良友忆旧:一个公司与一个时代》282—287页、294页,北京:三联书店,2002年。

② 参见赵家璧《编辑忆旧》195页、197页。

③ 参见邵凯云《年轻编辑赵家璧成就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大业的缘由剖析》,《河南大学学报》2005年1期。

④ 参见邵凯云《年轻编辑赵家璧成就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大业的缘由剖析》。

1935年3月15日刊行的《良友画报》第103期上,有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系列广告,其中包括赵家璧的《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》:“我们相信中国新文学的将来,只有向前进取才是最大的出路。这次我们集合许多人的力量,费了一年余的时间,来实现这一个伟大的计划,希望能从这部大系的刊行里,使大家有机会去检查已往的成绩,再来开辟未来的天地。”这“许多人的力量”,落在赵家璧所撰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前言》,便是:

这一个《新文学大系》的计划,得益于茅盾先生,阿英先生,郑伯奇先生,施蛰存先生的指示者很多,没有他们,这个计划决不会这样圆满完备的。蔡元培先生,胡适之先生,郑振铎先生,鲁迅先生,周作人先生,朱自清先生,郁达夫先生,洪深先生和上述的前三位,花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,替我们搜材料,编目录,写导言,使这十部大书得以如愿的实现,我借了这个机会,敬向他们深深的致谢。^①

阅读赵家璧将近半个世纪后所撰、详细叙述整个编辑出版过程的《话说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》,更明白《前言》中这段感谢的话并非客套——赵家璧的工作接近今天的“策划编辑”或“责任编辑”,主要是择善而从,联络各位编者,协调各方利益,以及宣传推广等。

在茅盾、阿英、郑伯奇等名家的指挥下,赵家璧勤奋工作,出色地完成了编辑任务;可这并不等于他对“第一个十年间中国新文学各部门综合的研究”有什么高明的见解。因此,编《导论集》时,将其为《大系》所撰的《前言》删去,一点也不奇怪。猜测那是因为同人倾轧或者本人谦虚,反而是多虑了。

良友编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,有很多“幕后英雄”,但未见“举帅旗”号令四方的“主编”。而这,正是这套大书成功的秘诀。

1932年12月14日,鲁迅撰写收入《南腔北调集》的《〈自选集〉自序》,回忆当初与《新青年》诸战友联手,积极提倡“文学革命”的辉煌,接下来便是那段感慨遥深的文字:“后来《新青年》的团体散掉了,有的高升,有的退隐,有的前进,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……。”^②三年后,郑振铎撰写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文学论争集〉导言》,回望那“伟大的十年间”,同样表现出无限的惆怅与凄楚:

① 赵家璧: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前言》,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建设理论集》,上海:良友图书印刷公司,1935年10月。

② 参见鲁迅《〈自选集〉自序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456页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年。

当时在黑暗的迷雾里挣扎着，表现着充分的勇敢和坚定的斗士们，在这虽只是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间，他们大多数便都已成了古旧的人物，被“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”了。……

最好的现象还算是表现着衰老的状态的人物呢！所谓“三代以上的古人”者的人物，还是最忠实的人物；也还有更不堪的“退化”的，乃至“反叛”的人物呢。他们不仅和旧的统治阶级，旧的人物妥协，且还挤入他们的群中，成为他们里面最有力的分子，公然宣传着和最初的白话文运动的主张正挑战的主张的。

只有少数人还维持斗士的风姿，没有随波逐流的被古老的旧势力所迷恋住，所牵引而去。^①

这里分辨“斗士”、“衰老”、“反叛”三种路向，与鲁迅的说法异曲同工。只是无论鲁迅还是郑振铎，都只讲类型而不牵涉具体人物。后世的研究者固然可以断言谁高升、谁退隐、谁前进，当初却没有人愿意“对号入座”。

赵家璧的《话说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》撰于1983年，受时代氛围的限制，再三辩解为何请胡适编《建设理论集》、请周作人编《散文一集》，还抬出郑振铎、茅盾来为自己撑腰^②。多年批胡适给作者心灵留下浓重的阴影，难怪其谈及此话题时仍心有余悸：“解放后，通过学习，我对五四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，对胡适的那套说法有了不同的看法。因此当我听到有人批评《大系》的第一卷不宜由胡适来编选，在第一卷里又没有选入好几位革命作家的重要文章时，衷心有愧。”^③胡适编《建设理论集》时是否“自吹自擂”，可以见仁见智；但其“舍我其谁”的姿态，当年的左翼文人并没有斤斤计较，反倒是作为编辑的赵家璧过于胆小了。至于说陈独秀更合适编《建设理论集》，可惜因在监狱中无法找到^④，这些都是外行话——且不说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贡献无人能替代，若

① 郑振铎：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文学论争集〉导言》，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文学论争集》20—21页，上海：良友图书公司，1935年10月。

② 参见赵家璧《编辑忆旧》172—174页、182页、202页。赵家璧回忆有误，胡适那时并非“北京大学校长”，且因其政治立场并不被政府欣赏，不可能“对审查会也许能起掩护的作用”；但要说“对一般读者”有“号召力”，那倒是真的。至于周作人，时人并不知道他日后会在抗战中“落水”，以他当年在文坛的地位及影响力，出任“散文一集”的编者乃求之不得，怎么会需要茅盾来为他辩解呢？

③ 赵家璧：《编辑忆旧》202页。

④ 参见赵家璧《编辑忆旧》202页、174页。

真由“老革命党”、性情上更为偏激的陈独秀来编这一册，效果肯定不如目前的状态。

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已严重分化，早年同一战壕的战友，如今可能因政治立场歧异而互射“明枪暗箭”。即便如此，彼此间还没到你死我活、不共戴天的地步。十卷“大系”的编者，有左翼人士，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，但没有右翼或封建遗老，基本上都是坚持五四新文化立场者。“道”不太相同，友情日渐稀薄，很可能互相不服气，这个时候，合作编书可以，但要说听谁的指挥，那是做不到的。他们可以接受一位年轻编辑的意见，因其代表图书公司的利益，但不可能听从任何一位编者的“帅令”。

如此弱小的“主编”，促成了十位立场不太一致的名家“真诚合作”，此乃“大系”神奇之处。正因为“主编”太不权威了，十位编者选编及撰写“导言”时，可以海阔天空，自由飞翔。当初出版社约定，每人编辑费三百，序文千字十元，这在当年是非常优厚的待遇；但鲁迅认为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“导言”不一定非撑到两万字不可。于是，鲁迅致信赵家璧，称“意思完了而将文字拉长，更是无聊之至”；因此，宁愿“序文不限字数，可以照字计算稿费”^①。出版社后来也意识到，“导言”以二万字为标准，“这种要求确实不很合理”^②，因此听任每位编者自由取舍。阿英编《史料·索引》卷，《序例》不到五千字；洪深编《戏剧集》，撰写《导言》时下笔不能自休，洋洋洒洒六万言，也都相安无事。

对于“导言”的体例以及编选的策略，“主编”完全不加干涉。朱自清编《诗集》，其《导言》变成了五块，短论加四个附录——“编选凡例”、“编选用诗集及期刊目录”、“选诗杂记”和“诗话”；周作人编《散文一集》，撰《导言》时继续“文抄公”试验，不断引述自家以往所撰文章；郁达夫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将《散文二集》三分之二的篇幅给了自己最为欣赏的周氏兄弟。各卷的编者全都“一意孤行”，不把“主编”放在眼里，这在日后刊行的《大系》各续编中，都不可能再出现了。

有大致的倾向——这毕竟是“新文学”的“大系”，必须坚守五四新文化人的价值观；但没有僵硬的指标——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，“悉听尊便”，并不强求一律。这一奥秘，被最早为《大系》撰写书评的姚琪一语道破：

不过是因为分人编选的缘故，各人看法不同，自亦难免，所以倘使

① 参见《鲁迅全集》第十二卷 616 页。

② 参见赵家璧《鲁迅怎样编选〈小说二集〉》，《编辑忆旧》241 页。

有人要把《新文学大系》当作新文学史看，那他一定不会满意，然而倘使从这部巨大的“选集”中窥见“新文学运动”的第一个十年的文坛全貌，那么倒反因为是分人编选的缘故，无形中成了无所不有，或许他一定能够满意。^①

除了作者以戏班作比喻，夸奖《大系》各卷编者的“角色”配搭得很匀称，更因为“五四”本就是一个“众声喧哗”的时代，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《大系》就该编成这个样子。任凭各卷编者自由发挥、各行其是，在我看来，乃《大系》成功的保证。而这，恰好是“主编”很不权威而导致的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

三 “工程”何以能成功

完成如此浩大的出版工程，犹如打一场胜仗，需要“天时地利人和”的配合。某种意义上，时势比人强，且“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”。假如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不是在1935—1936年间出版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，推后一两年，抗战全面爆发，此事绝难进行；提前五六年呢？那时新文学内部正忙于论争，火药味很浓，彼此伤了和气，也很难开展真诚的合作。恰好就在这个相对平静的空档，敏感的年轻编辑赵家璧以及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抓住机遇，成就了一件大好事。

因得到诸多高人的热心指点，整个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的出版过程进行得很顺利。“大约在1934年的三、四月至七、八月间，《大系》的基本轮廓有了，编辑这样一套《大系》的必要性已肯定了，但如何分卷，请哪些人来担任编选，全未着落”；“十位编选者确定以后，我去谒见蔡元培，那大约是在岁尾年初，时间快进入1935年了”；“1936年2月，《史料·索引》终于由装订作送来了样书。这样，酝酿于1934年的一个理想，至此终于全部实现了。”^②这么重大的出版工程，从酝酿到完成，总共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，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。想想日后“大系”各续编的工作进度，就明白其中的差距。

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这套大书，首先取决于各位编者的积极配合。而诸多名声显赫的编者，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听从一位小编辑的“驱使”，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，除了报酬优厚，更重要的是此出版计划深深打动了他们。赵家璧描

① 姚琪：《最近的两大工程》，《文学》5卷1号，1935年7月1日。

② 参见赵家璧《话说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》，《编辑忆旧》169页、203页、212—213页。